淮河叙事

李振秀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(第六季)征文

在地理上，淮河是一条奇妙的河，它是秦岭—淮河线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国1月0℃等温线和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的大致分界线。

大气变暖之前(这是个不明确的时间词)，淮河以北的河流冬季结冰，以南的河流通常不结冰，会静静流淌。现在的情形，这一规则基本不再准确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淮河在中国地理上是一条重要的河流，它位居我国大江大河的第六位。

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，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。自古以来，淮河与秦岭的连线就作为我国南方与北方的“地理分界线”。早在《晏子春秋》中就有“桔生淮南为桔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的记述，形象地指明了淮河流域作为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的特征。

至于降水，得靠划分在秦岭和淮河沿线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来说话：淮河以北年降水量小于此数值，淮河以南则大于该数值。这线是依据历史观测和气候常态划定的。当然，实际雨量往往有波动，这点，淮河流域的水文记录最有发言权。

有一次，跟人聊天，说到淮河，他说：“你在淮河东岸工作多年，可知道淮河发源于一座古井？”初中学地理时，仅知道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，经洪泽湖入黄海。它南以大别山和皖山余脉与长江流域为界，北以黄河南堤和沂蒙山与黄河流域毗邻。至于源头具体在哪，还真没有探究过。听他这样一说，就去查找相关资料，了解淮河的源头。

原来，战国时期，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典籍《禹贡》上就有记载：“导淮自桐柏，东会泗、沂，东入于海。”确切地说，它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县境内的桐柏山主峰太白顶(又叫大复峰)。桐柏山位于桐柏县城西南，山势巍峨挺拔，植被郁郁葱葱。据说沿着陡峭山路可攀上主峰太白顶，山顶有一古寺，名曰“云台禅寺”，始建于唐代。古寺的北面，有一眼清澈明净的泉井，井内有泉眼三处，虽久旱而不竭。僧人踽踽而行，从井中取水，供养佛陀及自身。据说这里就是千里淮河的源头：泉水从井旁石壁中心流出，流不多远便潜入地下，行约半里，再从枯藤缠绕、青苔覆盖的峭岩间流出地面。如此盘绕迂回，潜入钻出，逐渐由细流汇成小溪，又由无数小溪汇合成小河，直到桐柏县城以西15公里处的小镇固庙，才开始形成明显的河床。因此，历史上也曾把固庙视为淮河之源。

淮河从太白顶起源，潜流入崖，穿山越滩，迂回曲折，冲出峡谷，开始了它奔腾东流的历程。一路上，它收纳南北两侧众多支流，水量迅速增加，水位上涨，河面变宽。尤其在穿过崇山峡谷、丘陵洼地之后，淮河在寿县正阳关与颍河、淠河相会，骤然变为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，形成了“七十二水归正阳”的奇观。

淮河从源头到河南、安徽交界处的洪河口，长382公里，是它的上游。这一段淮河穿行于山地和丘陵之间，具有山溪性河流的特点，水流比较湍急，水位暴涨暴落。自洪河口到江苏省洪泽湖出口处的中渡为中游。淮河中游北岸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，南岸为江淮丘陵，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分水岭。从洪泽湖出口处的中渡到三江营或扁担港入黄海为淮河下游。从淮河源头到入海口，全长1000余公里，流域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。

有一句老话：“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。”淮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，两岸分布着丰富的古人类遗址，现已发现有仰韶、龙山、青莲岗、大汶口等文化遗址100多处。出土的文物证明，淮河流域在数千年前就已有了农业和畜牧业。我国的孔孟儒家学说、墨家学派、韩非和李斯的法家学派，都与淮河流域有着深厚渊源。这里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，其中就有汉淮南王刘安。

淮河与八公山相关的河段长约12公里。此段从涧沟镇朱厂村往北流向八公山乡赵台村，由南而北，直至凤台县硖山口，一改我国多数河流自西向东的走向。史前传说大禹治水时，因势利导，斧劈硖山，桀骜不驯的淮水被疏导后，性子温顺下来，恢复东西流向，携带着周边支流，继续东进入海的历程。

千里大河滋养着一方土地，孕育了无数人文艺术奇迹，留存着众多文化遗产。我常常站在八公山上、淮河的东岸，望向西岸。汉淮南王刘安就在此段淮河东岸的八公山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《淮南子》。这部著作取材宏富，涵盖天文地理、兵略治术、草木鸟兽、风俗道德等，融天道人事于一炉。刘安发扬光大老子“上善若水”的道家思想，又不局限于“老庄”思想，兼收并蓄各家所长，堪称奇书。书中第一次根据观测完整记录了“二十四节气”，千百年来指导着大江南北的农事活动，推动着文明进程。刘安还在炼丹时，以水溶法制成了素食奇珍豆腐，对人类饮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正是刘安，让淮河岸边这座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八公山，成为了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的文化名山。

此段淮河两岸还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，如黑龙潭、白龙潭、淮王鱼、带挂将军的传说……河流孕育着诡谲的故事，故事让淮河散发着温度，让人记得它是一条有情愫的河流，暂时忘却它在历史上曾经的肆虐。今天，站在河东望河西，农舍、田野、行人遥遥可见；若时空浩渺，隔着深深浅浅的河湾，又似咫尺天涯。只有一种情况例外：当桐柏山来水充沛，流域内连降暴雨，众多支流奔涌至正阳港时，《诗经》中“钟鼓锵锵，淮水汤汤”的景象便会重现——淮水势如洪兽，锐不可当，东西连成一片，不见河岸，农舍田野皆被淹没。这样的场景，千百年来发生过许多次，我们有生之年也遇见过多次。

从前，到河西需经何台轮渡(人车可过)，或从朱厂渡口下船至曹集。如今，两座“彩虹”横跨淮河：一座是2008年通行的合淮阜高速大桥，另一座是2019年底开通的商台杭高铁大桥。桥梁连接起河东河西，缩短了空间距离。更重要的是，引江济淮工程的通航，让地理书上的南水北调构想在眼前成为现实。东淝河是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重要水道，长江水经由寿春港进入淮河，正式参与到淮河流域的生产生活中。天上的降水补给地表径流，引江济淮则实现了跨流域水资源的统筹调配。朱厂村和赵台村的2400余户、6800多人，因引江济淮工程和淮堤建设需要，整村搬迁至寿西湖农场的安置小区。从空中俯瞰，安置楼群像飘荡在寿西湖麦浪里的小船。两个村的村民站在自家楼层，隔着楼宇，迎着阳光相互问候。五里之外的淮河泛着清波向北流淌，十余里外的小麦吐穗扬花，在春风中荡漾。

2025年3月30日下午，坐标东经116.77°、北纬32.62°，淮河岸边，八公山乡党委副书记毕汝俊同志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图文并茂的消息：“第一次利用淮河水润泽1800亩张管村南湖，排涝10000亩，淮水首次温顺地漫过先民逃荒的故道。千百年来被淮水虐，终于利用一下子了。”春三月的八公山下，梨花盛开如雪海，柴油泵机轰鸣着，汇入春天的交响。灌溉渠中的淮水清澈平缓，裹挟着桐柏山独有的岩屑气息，漫过宋代镇河铁牛锈蚀的基座。这场持续三千年的水土博弈终于迎来转折——昔日撕裂田亩的洪流，此刻正滋养着沉甸甸的麦穗，将“河东河西”的沧桑谚语，改写成“人水共和”的新时代注脚。

汀洲舞羽 蔡晓阳 摄

抗战中的花鼓灯歌

苏登芬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卢沟桥一声炮响，日军侵华战火从关外烧到关内，燃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激起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怒火。千里沿淮也和全国各地一样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。沿淮百姓以淮河本土的艺术宣传抗日、发动群众，许多花鼓灯歌通俗易懂、铿锵有力，真切地宣传了抗战精神，揭穿了日寇侵华的无耻嘴脸，鼓舞了一方群众。

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，魔爪慢慢向内地延伸，淮河两岸也燃起战火。沿淮花鼓灯艺人气愤地编唱：“小日本鬼子放狗屁，‘东亚共荣’把人欺，杀光烧光带抢光，‘三光’政策活土匪，他是希特勒的把兄弟。”

日本鬼子侵占沿淮各地后，为控制淮河岸边群众，在沿淮各县、街、镇设哨所，以便侵吞掠夺。怀远一带花鼓灯老艺人唱道：“小日本鬼子太疯狂，经常出洞大扫荡，又抢物又抢粮，拉牛拉猪带拉羊，强奸妇女无其数，到处去抓花姑娘，遭污的妇女悬了梁，居家老少哭断肠，小日本人面兽心活豺狼。”再有：“日本鬼子大扫荡，桌椅板凳全烧光，活牛活猪被捅死，火燎生肉喷喷香，又是吃来又是唱，哇哩哇啦乱叫狂，活像一群人面狼。”

日军侵入沿淮后，地方一些有名的恶棍厚颜无耻地当了汉奸，并拉拢一批地痞、流氓和民族败类充当日军耳目。群众气愤地称这类无赖为土匪、鬼便子、大褂队，歌词道：“大褂子队，黑吊脆，拉人家老驴扛人家被，跟着杨立山不缺吃和穿，跟着杨立言不缺零花钱，跟着李俩子不少老妈子(妻子)，跟着李昆山照吃鸦片烟，往南看一片枯秧，往北看一片汪洋，东西湖里蓑草长，到了秋后去逃荒。”(以上杨、李四人是沿淮有名的土匪头子、汉奸。)又唱道：“自从事变几经秋，铁马滔滔从未休，冤气塞天心月暗，妖风遍起神鬼愁，地痞流氓能高贵，道德文章反下流，社会场中诸大老，无非拍马与吹牛。”

日本鬼子无恶不作，飞机轰炸、“三光”政策肆虐，导致民不聊生、四处跑反。“提到跑日反实在可怜，大山深处淮河湾，过河的难民有万千，渡船炸得稀巴烂，难民吓得到处窜，上面飞机扔炸弹，大人小孩都跑散，哭的哭喊的喊，到处尸体无遮掩，渡口变成鬼门关。”在淮河之滨的凤台县，有一个人口居住集中的三里沟，日本鬼子气急败坏地血洗三里沟。三里沟有个壮年汉子与鬼子拼搏的事迹被编为佳话：“三里沟有个壮年汉，在外逃荒把家还，肩上挑着锅和碗，刚进村只见火冲天，日本兵正在烧房子，壮汉一见怒冲冠，顺手抡起大扁担，打的鬼子命归天，来一个打一个，只打得个个瞪眼不动弹，日本兵越来越多将他围，大扁担照样飞舞上下翻，日本兵死伤七八个，村前谷场上一片鲜血染，壮汉子最后躺在血泊中，手中还紧握大扁担，神州儿女多奇志，这就是中国男子汉。”

日伪横行乡村的日子里，百姓怒不敢言，但男女老少上阵打鬼子的热情猛涨。有女子劝恋人去当八路军：“花鼓一打脆生生，知心话儿阿哥听，阿哥报国心常在，岂以恋妹了此生，劝郎去当八路军。”劝丈夫打鬼子的歌更多：“小郎子，已十九，快快跟上队伍走，国家危险正用人，建功立业是时候，学打枪，学放炮，找长矛和大刀，鬼子来一个杀一个，鬼子来一窝捅一窝，不管他什么武士道，叫他跪地打哆嗦，有朝一日胜利了，俺给你烙韭菜盒。”年轻人心强气盛，一旦参了军，杀敌心切，歌词道：“骑白马，挎洋枪，哥哥我吃的八路军的粮，有心回来把妹你探望，为了打日本我就顾不上。”

在全国上下一片反日的抗战声中，花鼓灯歌词由低调转入高调，有歌道：“花鼓一打头对头，听说打日本来了劲头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打得日军缩了头。”在抗日烽火热火朝天的日子里，沿淮人民在抗日即将胜利的形势下，在歌词中唱道：“中华盛世话沧桑，多少年前事未变，日寇逞强穷黩武，炎黄裔胄尽遭殃，山河破碎英雄泪，国土光复名气扬，但愿中华成一统，海峡两岸莫彷徨。”

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，淮上著名花鼓灯老艺人武佩选(艺名气死猴)到田家庵、大通等地办事，应玩友之邀，高兴地在广场唱起了：“锣不打，鼓不敲，小日本投降真正孬，大鬼子不骑高头马，二鬼子不挎东洋刀，只背水壶和饭包，一人扛着一把锹，大通街上把阴沟掏。”

1949年全国解放，花鼓灯艺人当家做主，欢天喜地唱起了花鼓歌：“花鼓一打真正好，唱起灯歌送代表，代表送去开大会，讨论田地要分配，分田地自己累，分牛马自己喂，穷人从此不受罪，穷人翻身真得味。”1953年全国首届民间文艺会演，著名花鼓灯窝子五咀子的花鼓灯著名传承人王考千(艺名一阵雾)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会演，正值北京“五一”联欢会，王考千即兴唱道：“岔伞一打出彩云，锣鼓带来祝贺声，玩灯招过人千万，五三年会演到北京，五月一日大游行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，总结报告我们听，花鼓灯传人有了靠，四海一片欢呼声！”

战争的烟云已消散，但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永远不能忘记。朴素的花鼓灯歌，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，也唱出了保家卫国的士气，那质朴的韵味永远在心中回响……

□随 笔

谁行胸臆

高 旭

有的文章，一旦读到，可能便会终生不忘，如一棵树一样，永远扎根在你心里，而它对你的影响也只会历久弥深。

大学时曾读到周国平所写《人生贵在行胸臆》一文，快二十年过去了，每次重新翻读，仍然由衷地喜欢、认同和欣赏，觉得确实写出了人生应有的理性自觉、生存状态与精神风采。

在周国平眼中，明代著名文人袁中郎(宏道)是一位真正能畅行自我胸臆的倜傥名士。不论是做人，还是为文，他都能将自身的真“个性”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，能“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，活出自己的本色来”。

要想活出本色，活出真性情，这绝非易事！周国平笔下的“袁中郎”，实因其有才、有悟、有识、有品，方能一生行己所愿，不悔所弃，“好好地活过一场”。

袁中郎有的是“逸才”。在晚明文坛上，他与其兄袁宗道、其弟袁中道并称“公安三袁”，都“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”，是晚明“性灵”文学的开拓者、代表者。中郎自言其为文是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，非从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笔”。平生最喜山水朋友，初到吴县为令，便致信友人云：“吴中若有此令也，五湖有长，洞庭有君，酒有主人，茶有知己，生公说法石有长老”，又曾云：“天下有大败兴事三，而破国亡家不与焉。山水朋友不相凑，一败兴也。朋友忙，相聚不久，二败兴也；游非及时，或花落山枯，三败兴也”。中郎所写文字，大都如此，率性而为，“潇洒不俗”，少有伪饰造作之语。这种超群逸众的文学才能源于他“内在性灵的自然流露”，实为性情所致，不可强求。

袁中郎有的是“彻悟”。中郎虽有“听断敏决”的为官治事之能，并非纯为一文士而已，但却始终不喜宦海沉浮的生活，对名利生死看得极为通透。中郎曾诋斥醉心名利权势之辈云：“天下皆知生死，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……趋名骛利，唯曰不足，头白面焦，如虑铜铁之不坚，信有死者，当如是耶？”在他看来，常人对名利权势的追逐永无尽头，只会是“终身驰逐”，至死方止。但是，人的一生绝不应如此度过，而是要学会“享受生命”的真乐趣。因此，中郎生平力主“得趣”的生活态度，认为“世人所难得者唯趣”。他认为，保持一颗不受功利污浊浸染的“赤子之心”，发现和享受爱情、友谊、自然、艺术等带给人的无限意趣，才是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，中郎说：“人生不得行胸臆，纵年百岁犹为夭”。中郎让自己和“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，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性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”，也以此让自己“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”。不得不说，中郎实在是个以此中的“聪明人”！

袁中郎有的是“卓识”。中郎把自己的人生观总结为“适世”一说，认为与儒家的“谐世”、道家的“玩世”、佛家的“出世”不同。中郎身为晚明文士，实则于儒释道三教都深受熏染，但是他却想跳出三教的拘束，寻找一条适合自身洒脱性情的新路来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想做“凡间仙，世中佛，无律度的孔子”。因此，中郎人在俗世而不厌俗世，只是希望自己不为俗常礼教所拘束罢了。他甚至批评佛祖和达摩舍太子之位出家，认为二者都是“不圆之甚矣”的矫作所为，如果是真修行，“当时便在家何妨，何必掉头不顾，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？”中郎还认为儒释道三教根本上都在“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”，而这更是不切人生实态的虚迷幻想。在他看来，人不应为生死所困，只要“好好地活过一场，也就死而无憾了”。中郎完全有着自己独立、独到的人生认识，从未在思想上放弃过自己人生的主动权，这也是他真能不落流俗的根本原因。

袁中郎有的是“高品”。对“人生的实质”的彻悟，对“生命的热情”的赤诚，让中郎有着不同凡俗的精神境界，没有变成封建时代常有的“俗人”“俗物”。中郎不喜为官，所以平生实际从政时间较短。他对做官以外的事情，总是充满盎然的兴致。爱山水，便说落雁峰“可值百死”；爱朋友，便叹“以友为性命”；爱女人，便坦陈有“青娥之癖”；爱读书，便会在“灯影下读复叫，叫复读，童仆睡者皆惊起”。其实，中郎真正所爱的是“终归还保留着一种自己的真兴趣真性情”的“快活”生活！中郎对人生的理解在最大程度上返回到了“人生”本身，因此他在精神境界上是远远超拔于庸常之士的，是能“怀着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”的自由的生命个体。

古往今来，士人无数，但又有几人能如袁中郎一般想得开、看得开、做得到呢？周国平作为哲学家，最欣赏中郎的地方既在于他是能为“常人而肯安心”者，也在于他是虽为常人而不持“俗心”者。我对中郎的欣赏，对周国平文章的喜欢，也是如此！

人生贵在行胸臆。但须知，没有相应的才、悟、识、品，恐怕很难如人所愿。也许，只有我们终身努力不懈地守好本心，力行所愿，庶几能有实现之时吧！

□散 文

伞之爱

徐满元

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，童年时就发现：大人们下雨天干农活时，都是穿蓑衣、戴斗笠，只有雨天走亲戚时，才舍得拿出跟宝贝疙瘩似的油纸伞——仿佛那撑开的不是伞，而是门面和脸面。

于是，伞对于我便有了一定的诱惑力。我有时想借下雨时帮大人放牛的机会，把那伞拿出来打一打，大人们却用各种理由说服我以穿塑料雨衣代替打伞。我打伞的欲望也就只能像伞一样收紧在心房之一隅。

直至上初中时，我才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伞。尽管雨天上学时有着诸如道路泥泞、书包淋湿等不便或麻烦，但因为能用上伞，快感便将忧愁撑散。

但真正让我放眼伞之美的，还是参加高考时。第一次住上县城里的宾馆的我，从未有过地居高临下，分别看到了骄阳和阵雨下盛开的伞花。这是我在乡村和就读高中的小镇上看不到的风景。这些被骄阳或阵雨催开的遮阳伞或雨伞，多像我故乡河、塘里绽放的荷花。不同的是，这些伞花是沿着街道的“河床”铺展开来的，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、花花绿绿、重重叠叠、袅袅娜娜。这让人情不自禁想起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：“有袅娜地开着的，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……”于是猜想，那每一把花伞下，大概都有一个受庇护的身影，她们就像被荷叶遮风挡雨的荷花，清香远溢，姿色迷人。此时的我，多想做一只幸福的蜻蜓，去把那心中的荷花轻吻。连那吻印也像字据上盖下的印章一样有了仪式感。

这也让我第一次体悟到：伞竟然如此具有诗情画意。后来书读多了，再仔细思索一番，也就幡然醒悟了。

且不说戴望舒那首尽人皆知的《雨巷》：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/彷徨在悠长，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飘过/一个丁香一样的/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明丽的语言、优美的诗句、无穷的韵味、淡雅的意境，都成了人们俯拾即是的喜欢的理由。我就想，伞与姑娘本来就是天然的绝配——这一点，在如今的不少舞蹈作品中也得到了印证。

于是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小时候就熟知的刘春华的油画作品《毛主席去安源》。画面中，毛主席手握一把油纸伞，将其置于腋下，身后却乌云翻滚。这把油纸伞，仿佛是为抵御前路风雨而备，让我看到看似柔弱的油纸伞，在伟人手中也承载着坚定的信念与担当，蕴含着平凡中的不平凡。

稍大些看黄梅戏电影《天仙配》，董永手持雨伞，为换取安葬父亲的费用而心甘情愿卖身傅员外家为奴。这一情景无疑也是对民间广为流传的“晴带雨伞，饱带饥粮”说法的最好诠释，让我看到了伞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分量。

正因这些看似点点滴滴的累加，我对伞的喜爱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减，反而爱得越深。偶遇闲暇雨日，我还会撑着伞独自到雨中漫步。感觉那雨正与伞窃窃私语，而伞恰似一只张开的大耳，在侧耳倾听。那雨与伞的吻印则幻化为四溅的花瓣，我却成了伏于花蕊的蜂蝶，恋恋不舍，醉意朦胧。正是这种情感基础，让我当年能写出发表后引起年轻读者广泛共鸣的诗句：“我的心/是一把收拢的小红伞/在多雨的季节/为你撑开……”

是的，如今的我，心中一直撑开一把伞。伞外熙熙攘攘、红尘滚滚，云卷云舒、电闪雷鸣；伞下从从容容、风平浪静，优哉游哉、一片安宁。

藤花伴厦 左先法 摄